

中外交流理论与实践

创新多元文化主义: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的亚洲应用

施旭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 311121)

摘要:当世界日益走向分裂对抗之时,亚洲如何凝聚力量砥砺前行?以文化多元为特征的亚洲,作为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一项有效战略,应构建一个整体、辩证、系统的新多元文化主义,即让传统的多元文化主义拓展成基于亚洲文明的,融通本土-全球、国内-国际、少数民族-主流民族的新理论、新政策、新实践;换言之,将人类理想与亚洲精神贯穿于本区域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全过程。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殊形态和属性,文化话语研究也可以成为理解和引导亚洲新多元文化主义的有效和有益工具。对于一系列亚洲多元文化的话语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亚洲发展繁荣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人类/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方法;文化话语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0/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178(2026)01-0057-10

引言

当今,亚洲占世界人口60%,占全球GDP的40%以上,而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便是其多层次多领域多属性的文化图景——包括语言、信仰、种族、历史、政体、艺术、科学、发展水平等。显而易见,这样色彩斑斓的亚洲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资源、潜力和优势,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多元文化因素也孕育着潜在或显性的复杂矛盾;而全球化、多极化、数字化、智能化,加之域外势力的强行干涉,更给亚洲社会的文化发展,乃至国际秩序的演进,带来巨大的挑战。为有效应对亚洲人民面临的这种严峻考验,中国适时提出了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倡议,包括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安全共担、文明互鉴,旨在实现共生共荣的区域秩序和综合体系。换言之,倡导各国各民族通过深化合作、共担责任、促进交流的中国方案,为亚洲

收稿日期:2025-12-1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研究(20&ZD140)”子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22&ZD313)”子课题“话语体系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施旭,男,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人才,主要研究领域:文化话语研究,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引用格式:施旭. 创新多元文化主义: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的亚洲应用[J]. 中外交流研究(中英文),2026(1):57-66.

走向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本文提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作为政治理论、国家政策和社会实践,应该也可以成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工具。历史上,多元文化主义彰显并提升了人类文化多样性、平等性、尊严性的价值和地位(Abu-Laban et al. 2023; Parekh, 2002; Taylor, 1992)。毋庸置疑,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和传承的核心逻辑。在当代全球时代变革的新形势下,原始的多元文化主义显露出一些局限和缺陷(见下文)。因此,我们需要吸纳时代潮流、全球视野、人类价值、国际关系、主流民族等元素,以创建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新版本。这是本文要论述的第一大论点。第二大论点是,作为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的文化主义创新模式,文化话语研究应该也可以成为认识、理解、评价和引导新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有效、有益框架。新(旧)多元文化主义,无论作为哲学观念、公共制度,还是日常生活,都具有不可或缺的话语属性和特点:它要有传播者和接受者,要有表达的内容与形式,要有沟通的工具和渠道,要有相应的交际时空环境,要有特定的交际历史和文化关系(Levey, 2025)。因此,对于涉及多元文化主义问题的各交际要素及其关系的识别、分析、阐释、评价以及指导,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多元文化主义本身。为说明该范式的应用方式和意义,文章最后讨论一系列让新多元文化主义促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问题。

一、反思传统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尤其在20世纪60至90年代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先行者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后来以不同形式逐渐出现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其基本内容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内求得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包容和体现。在本质上和现实中,它涉及的是少数民族如何在一个主流社群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内生存的问题;或者说,事关少数群体的权力(Kymlicka, 1995)。斯坦福哲学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这样定义:“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对以种族、民族和宗教等划分的少数群体的承认与接纳(... multiculturalism is the recognition and inclusion of minority groups defined primarily in terms of ethnicity,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历史方面的原因。一是二战后大规模移民潮导致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剧变,新移民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融合成为迫切的社会与政治议题。二是民权运动与身份政治的兴起,对传统的社会秩序与文化霸权提出了挑战。美国的民权运动、加拿大魁北克的民族运动、以及全球反殖民的解放浪潮,把平等与文化尊重的理念推入了政治核心。三是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比如以“大熔炉”“沙拉盘”或“脱胎换骨”等隐喻代表的社会改革形式,虽有与主流社会的和解意图,但往往伴随着对少数文化的歧视和压迫,而移民后代的身份更在母国文化与主流社会之间产生裂痕。

在此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新理论和新政策的出现,旨在自由民主制度内承认差异、保障权利、促进社会凝聚,以协调文化多样性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力。其核心议题包括了群体权利与个人自由、公民身份的重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移民与融合政策、原住民自决权、文化多样性治理、多元教育、公正表征。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是对上述少数(移民)民族身份和权力相关的社会矛盾的回应。

多元文化主义尽管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改良效果,当今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冲击和挑战。全球性的单边霸凌、分裂对抗、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数字鸿沟等等,正在将社会分裂动荡趋势推向高潮。一些政客甚至学者错误地将这些现象归咎于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另一方面, Abu-Laban 等(2023)、Hall(1990)、Levey(2025)、Kymlicka(1995)、Kymlicka 等(2005)、Parekh(2002)和 Taylor(1992)等学者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辩护,而且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新观念、新策略;比如,对于文化差异应当采取一个多元的视角,将人类共性与文化差异看作互动关系。

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治理论、共同政策或社会实践层面上,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总是限制在个别、单独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且往往是特殊国家政体(如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框架内,而没有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如权力),与全球、与人类、与未来关系的考量;而且聚焦的对象只是少数(移民)群体,与主流群体(包括与其的权势关系)无关;更重要的是,只是局限于少数民族的语言、种族、宗教、习俗,却不考虑社会生活的其他往往更深层次的关系(如政治、经济、教育)。当今 21 世纪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化与逆博弈、多极化加速演进、新冷战与单边主义抬头、后疫情时代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数字鸿沟加深、民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泛滥等一系列全球性、人类性、连锁性矛盾运动之中。

除此之外,囿于个别、本土的多元文化主义,在观念、理论和实践上还缺乏对于话语交际层面的考量。必须看到,话语交际在上述全球性、人类性、连锁性的世界级现象中起着既普遍又关键的作用。当美国总统错误地将新冠病毒源头指向中国后,在美国便出现了反华、反华裔美国人的情况。同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在世界多地掀起了反种族主义的波浪。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多元文化主义无论在理论视域、价值立场,还是政策措施上,都还不足以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政治、文化话语的挑战。不超越个别的、本土的、历史的藩篱,不触及普遍的、系统的、深层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不仅解决不了本土、本区域、本国的社会矛盾,更无助于消解全球的、人类的、未来的生存风险与挑战。

二、创新多元文化主义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整体、包容、辩证、系统,具有全球视野、与时俱进、关怀全人类

未来、直面权力矛盾的新多元文化主义,即主张民主自由、文化认同、文化平等、文化正义,必须贯穿于全人类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社会生活的全过程。这里,文化不局限于语言、宗教、民族、国家,而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而这里的新文化主义本身包含文化主义的多元性。这意味着,各地区、国家、民族、团体必须一方面相互尊重、团结合作、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反对霸权、分裂、排斥、对抗,特别是当下突出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右翼民粹主义,使人类不同文化社群共同朝着谐发展与繁荣的方向前行。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发展水平不同,实践多元文化主义的道路和方式也需要区别对待。同时,数字化技术拓展了文化表达空间,但也带来信息茧房、算法偏见与数字鸿沟等问题,因此升级版的多元文化主义必须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并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包容性与高质量的发展。换言之,新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全球本土的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社会实践,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关乎个人,也联系群体;既有拥护的一面,也有反对的一面;既要求统一,也照顾差异。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明确提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①。中国作为世界一个重要且特殊的文化群体,更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体现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文化视野与理想,描绘了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人类未来图景,供世界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取得共识。就其本身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解决人类共同挑战提出的创新理念。它以合作共赢为核心,通过政策导向、实践路径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理念不仅回应了利益矛盾、实力差距和价值冲突等现实问题,更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思考与实践创新,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需以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包容、共同安全和生态保护为基础,通过推广理念、改革治理、化解矛盾和实践行动等任务逐步推进。这一过程既需要中国发挥引领作用,也依靠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其成功将标志着全球治理从“对抗”转向“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新路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文化多元主义的创新,也为特定民族社群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为实现更加整体、包容、辩证且具有全球视野的新文化多元主义,需要在多层面展开系统性建设。在思想与知识领域上,应通过融合政治哲学、文化研究、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研究,构建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理论框架,并以“全球本土化”的视角,平衡地方文化自主与全球正义的联系。在制度与规则层面上,须推动各国将文化平等与正义原则纳入

① 习近平. 2015.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EB/OL]. (2015-09-29). 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0日。

宪法、法律及公共政策,保障少数群体在各领域的实质参与。同时,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建立跨国对话机制,探讨制定比如《新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公约》,使理念获得国际规范支撑。在教育层面上,要从中小学到高等教育体系,全面引入批判性文化课程,培养跨文化理解与不平等结构洞察力;并大力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面向青年、女性、原住民等边缘群体,开展深入的文化间对话项目。在数字科技层面上,要推动数字平台算法透明与伦理规范,防止技术偏见加剧歧视,辅以公共政策尽力缩小数字鸿沟。

三、新多元文化主义在亚洲的应用

如何将全球新多元文化主义应用于特定文化社群的理论、政策、实践体系中去?亚洲的核心特征就是多元多层次多关联的文化,体现在语言、信仰、种族、历史、发展水平等方面,而且这些不同方面的因素又相交联系。显而易见,这样的亚洲拥有巨大的资源、潜力和优势;但是,亚洲也凸显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外部方面,有“东升西降”趋势,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内部方面,有经济融合动力不足,安全架构滞后,文明冲突的隐患。从另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多极化、数字化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等因素,使得亚洲的文化变得更为微妙复杂。亚洲的多元文化、团结合作、身份认同正受到空前的挑战。

显然,亚洲语境下的新多元文化主义,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或其他所谓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情况相比大相径庭。从文化主义的视角和立场看,既需要探寻亚洲文化在全球语境下的总规律和特征,又要发掘内部的复杂差异和辩证关系。从新多元文化主义看,亚洲的研究必须瞄准亚洲的问题,采用亚洲的视角,顺应亚洲的需求和理想。

作为文明最悠久、文化最多样、发展最不均衡、现代性挑战最复杂的亚洲,是全球新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最具现实要求、实践潜力的社群。作为应对全球变局与亚洲内部挑战的战略选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亚洲多元文化主义方案。例如,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了《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全面系统阐述了命运共同体观,呼吁各国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① 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维护和平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肩负起来的责任。没有和平,冲突不断甚至战火纷飞,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人民往来等都会沦为空谈。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恐惧,实现安居乐业、普遍安全,希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经济发展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繁荣富强

^① 习近平. 2015. 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EB/OL]. (2015-03-28). 北京日报客户端, <https://xinwen.bjd.com.cn/content/s6656a88864b0115c9f853c69.html>. 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0日。

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基石。亚洲一些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正忍受着贫困、饥饿、疾病的折磨,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贫困、富足安康,希望各国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共同为孩子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让幸福和欢乐走进每一个家庭。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的亚洲。亚洲近几十年快速发展,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敞开大门,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封闭、融会通达,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2019:5)

这意味着,亚洲需要构建一种植根亚洲本土、联结国际社会的亚洲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框架旨在将全球愿景与亚洲现实相结合,构建一个根植于亚洲经验、回应亚洲挑战、造福亚洲人民的亚洲自主性、包容性的多元文化主义。

与此相呼应,学界提出亚洲多元文化主义应该是本土全球性对话,其目标应该是:为探究亚洲众多国家的宗教与政治传统——包括儒学、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如何从理论层面阐释民族多样性问题,这些传统为少数群体权利能提供何种思维空间,其容纳多样性的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范式存在何种差异,以及在国际规范层面达成真正共识是否存有任何可能性。在此议题上,无人能独断宣称自身掌握绝对真理。但可悲的是,少数群体遭受不公待遇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而新兴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亦存在自身盲区与隐患。若要构建一个能为所有民族——无论是多数群体还是少数群体——实现公正的世界,我们必须汇聚所能觅得的一切智慧与先例,携手共建。(He et al., 2005: 1-21)

朝着这一方向,如何认识理解当代亚洲多元文化现实、如何以学术创新来引导、促进亚洲文化矛盾的化解,助力亚洲文化和谐与繁荣,成为学界的关键问题。人类文化的演进、互动、冲突与融合,都无不通过以符号与媒介使用为特点的社交活动(communication)得以实现(Hall, 1990: 222-237)。可以看出更不难想象,为实现植根本土、联通世界的亚洲式多元文化主义的愿景,需要厘清已有的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创新性话语体系。我们认为,这里有一系列任务需要完成。首先且最重要的,是重塑亚洲自主的文化叙事,挖掘和转化“和而不同”“共生互鉴”等传统理念,形成具有亚洲特色的现代文化话语。其次,在公共传播层面,须搭建跨国家、跨阶层、跨年龄的立体对话平台,并借助亚洲公共文化频道等媒介工具,塑造包容性数字叙事,以技术赋能文化表达与对话,对抗文化同质化与偏见算法。再者,在政策层面上,制定区域性倡议推动各国政策协调。在文化遗产方面,教育体系应作为重要渠道和手段,让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形成生根,培养具有多元文化视野的下一代。

四、文化话语研究对亚洲多元文化主义问题的应用

“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CDS)”作为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中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坚持文化主义的新模式、新路径,应该也可以提供理解、引导和实践文化主义目标的路径(Shi, 2024; 施旭, 2022)。文化话语研究以文化主义为理论指导方针,构建了一套兼具全球性和本土性的交际学理论方法论框架。该理论将人类交际视为一个多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交际主体、意旨、媒介、效果、历史与文化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交际并非普世的抽象行为,而是由不同文化话语体系(cultural discourse systems)共同构成的多元统一体;它既是一个话语(discursive)系统,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系统。在此意义上,“文化”并非影响交际的外在因素,而是形塑包括主体、言行、媒介、历史在内的交际过程的基础。文化话语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揭示不同文化话语体系的特点规律和互动关系,其终极目标在于促进人类文化的平等与和谐发展。方法论上,它倡导“植根本土,胸怀世界”“文化自觉与文化批评”总体原则,即在学术层面上,借鉴国内外的智慧和技术,在社会层面上,兼顾本土与全球的现实和理想。这种多元统一的研究路径,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声张被边缘化文化的主体声音;通过这种研究路径,得以揭露歧视性话语,重建弱势群体的文化空间,并创造促进文明互鉴的新型话语。

(亚洲)多元文化主义,无论作为政治理想、公共政策还是社会实践都必须依托话语建构、维系、发展,而且这种话语必然体现(亚洲)文化特性和文化关系。根据文化话语研究的框架,我们可以提出几大类契合亚洲状况和特点的问题:(1)哪些个人、群体、平台是发声主体,谁的声音微弱或被排挤、被淹没,他们在全球话语秩序中的地位如何?(2)主流声音是怎样的,有哪些不同的声音,其本土全球之间的关系如何,尤其在团结合作问题上有何智慧和障碍?(3)有怎样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4)有哪些具有世界意义的智慧?(5)有怎样的共同价值、精神和理想,怎样的多样性?(6)有怎样的公民认同、亚洲认同、人类认同?(7)要求怎样的多元文化主义?(8)应该如何实现团结合作、可持续和平与发展、与世界共存与繁荣?(9)交流媒介(技术、符号、渠道)的使用状况如何?(10)亚洲话语体系演进的历史特点和规律是什么,有哪些共同的历史基础、经验、传统?与世界不同话语体系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必须综合研究成果以全面系统判断亚洲多元文化主义状况、得失、潜力,以为其发展提供战略支持。

当我们研究并回答了上述问题后,相信将对亚洲人民团结合作、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是凝聚共识。明确共同利益基础;通过深入研究亚洲各国在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能清晰梳理出亚洲人民共同的利益诉求。例如,在经济上,亚洲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消费市场,各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紧密相连,研

究能揭示出维护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共同利益点。这为亚洲人民团结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利益纽带,使各国人民认识到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从而在理论上凝聚起团结的共识。强化文化认同:亚洲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深入研究亚洲文化的多元性与共通性,挖掘其中蕴含的团结、和谐、包容等价值理念,能够增强亚洲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比如,儒家文化在亚洲许多国家都有深远影响,其倡导的“和为贵”“仁爱”等思想,为亚洲人民团结合作提供了文化滋养。这种文化认同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信任,为团结合作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第二是筹划战略。制定科学合作战略:对亚洲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能够准确把握亚洲发展的现状、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制定出符合亚洲实际情况的科学合作战略,明确合作的重点领域、目标和路径。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通过研究亚洲各国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需求和建设能力,可以制定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促进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提高区域整体的发展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亚洲地域广阔,各国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深入研究各国的资源优势 and 产业特色,能够合理规划区域产业布局,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比如,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另一些国家在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优势,通过加强合作,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and 产业的协同发展,提高亚洲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第三是抵御风险。增强应对挑战能力:亚洲面临着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病等。深入研究这些挑战的特点、成因 and 影响,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and 措施。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通过研究亚洲各国的能源结构、碳排放情况 and 发展需求,可以制定区域气候合作框架,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高亚洲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化解矛盾冲突:亚洲国家之间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存在矛盾 and 分歧。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根源 and 发展态势,运用和平谈判、协商解决等理论 and 方法,能够为化解矛盾冲突提供科学的思路 and 方案。例如,通过建立多边对话机制 and 信任建立措施,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 and 信任,逐步缓解紧张局势,维护亚洲的和平 with 稳定。

第四是创新理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对亚洲地区的发展特点 and 合作模式研究相对不足。深入研究亚洲人民团结合作、推动亚洲社会繁荣发展的实践,能够总结出具有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and 发展模式,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例如,亚洲的“和合文化”所倡导的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与西方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形成鲜明对比,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推动发展理论创新:亚洲是世界上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亚洲的发展经验 and 模式,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and 启示,推动全

球发展理论的创新。例如,亚洲的一些国家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促使学者们对发展理论进行深入反思和创新。

结语

面对当今逆全球化背景下对于传统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本文分析认为这种质疑的产生,不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本身的错误,而恰恰是外部其他的、更加广泛深厚的社会原因。本质上即是多元文化主义并未成为全人类的公共理念、政策和实践;换言之,是文化霸权的持续扩张。因此,文章提出了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包容等价值应该成为人类不同文化群体的共同精神意志、公共政策、社会实践。这也即是中

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具体体现。

面对当下国际社会日益分裂对抗形势下亚洲多元文化遭遇的内外挑战,同时也考验新多元文化主义对于特定社群的应用性,文章进而提出了亚洲如何凝聚力量砥砺前行的问题。以文化多元为特征的亚洲,作为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一项有效战略,应构建一个整体、辩证、系统的新多元文化主义,即让传统的多元文化主义拓展成基于亚洲文明的,融通本土-全球、国内-国际、少数民族-主流民族的新理论、新政策、新实践;换言之,将人类理想与亚洲精神贯穿于本区域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全过程。为全面系统深入认识、理解、指导亚洲的多元文化主义,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形态和属性,文化话语研究可以成为有效且有益的框架工具,因而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亟需澄清和破解的话语问题。

当我们回首近代亚洲的漫漫征途,有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奋斗不息,其思想如明灯照亮了亚洲追求自由与进步的道路;有甘地、尼赫鲁引领印度人民挣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枷锁,为亚洲民族解放事业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还有苏加诺为印尼的独立和国家建设殚精竭虑,积极倡导亚洲各国团结合作,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与压迫。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都怀揣着一颗为亚洲命运而拼搏的心,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对亚洲团结、独立与统一的执着追求。如今,时代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应当铭记先贤们的遗志,以他们为榜样,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念,树立起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参考文献:

- Abu-Laban, Y., A. G. Gagnon & A. Tremblay. 2023. *Assessing Multiculturalism in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New York: Routledge.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G] // Rutherford, J.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M].

-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He, B. & W. Kymlicka 2005. Introduction [G] // Kymlicka, W. & He B.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ymlicka, W.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ymlicka, W. & He B. 2005.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vey, G. B. 2025. *Research Handbook on Multiculturalism*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Parekh, B. 2002. *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i, X. 2024.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 Taylor, C. 1992.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 Essa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施旭. 2022. 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习近平. 2019.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6):4-6.

Innovative Multiculturalism: Asian Appl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SHI Xu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Abstract: In the increasingly divided and precarious world, how can the postcolonial, developing, and diversified Asia consolidate and achieve the peoples' aspiration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e present paper first argues for a holistic, dialectic and systematic no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That is, to achieve Asian harmony and prosperity, democracy and freedom, equality and justice, multiculturalism, as philosophical idea,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practice, must permeate the enti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Asian political systems, social norms, and everyday life – local and global. Next, it is suggested that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CDS) could and should serve as vital research tool, for multiculturalism, whether as theory, policy, or practice, has a significant discursive dimens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a series of pressing research questions of discourse essenti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new Asian multiculturalism.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 human/Asi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sian approaches;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责任编辑:徐波